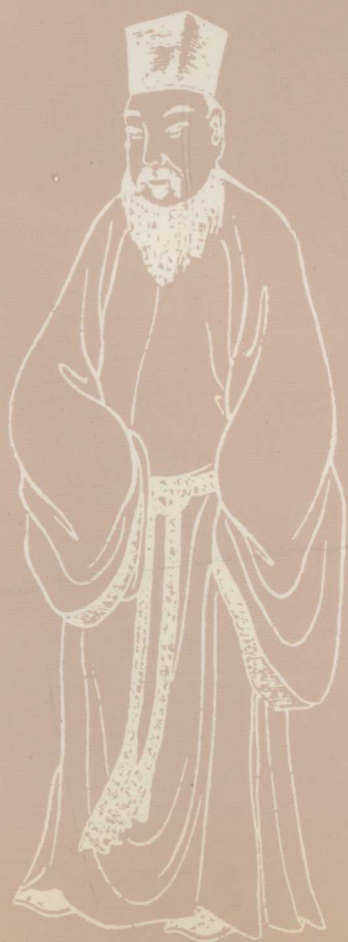


劉月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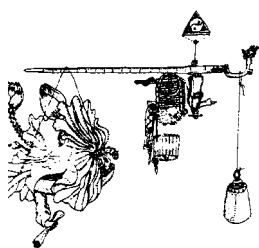
澳門歷史
語言文化
論稿

披雲署



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

劉月蓮著



I·E·C·M

INSTITUTO DE ESTUDOS
CULTURAIS DE MACAU

澳門文化研究會

2003 年 10 月出版



本書由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資助出版

基於學術自由和文責自負的原則，書中內容
並不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之立場

澳門文化研究會叢刊 ⑤

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

作 者：劉月蓮

封面題端：梁披雲

裡封題端：季羨林

責任編輯：高 戈

排 版：錢 榆

華輝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澳門文化研究會出版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印數：1000 本

澳門定價：50 元

ISBN 99937-699-0-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

李義林



序 一

陳得芝

劉月蓮博士2000年夏進入我校歷史系博士後流動站從事研究工作。在站期間，圓滿完成預定研究課題《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我有幸作為她的聯繫導師之一，多次聽她報告各階段研究的進展，每有新的收穫。書稿完成後，我又是最早的一個讀者，擺在面前的果然是一部研究材料有擴展，考訂解釋有創見，研究領域有開拓，富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優秀著作。

澳門自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租佔以後，從一個偏僻的漁村迅速發展為遠東的國際商埠，成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被的橋樑與樞紐，引起中外治學者濃厚的研究興趣。有學者認為，從中西交通史的角度看，澳門在近世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與古代陸上絲綢之路的敦煌差可比擬，因而澳門學與敦煌學可以相提並論。我相信隨着研究的深入，這個提法會越來越被廣泛接受。澳門回歸祖國前後，人們更加關注從各個方面研究澳門，有關澳門學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但迄今為止，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在中西文明融會的背景下對澳門的混合語言、族群演變等方面進行研究，則尚屬少見。劉月蓮博士的歷史學、語言學的根柢很好，在我校從事研究期間又

得到了著名語言學家魯國堯教授和民族史、中外關係史專家劉迎勝教授的悉心指點。其《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在認真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掘多種重要資料，利用其長期居住澳門，從事語言文化教育工作，從而瞭解當地語言（包括葡萄牙語和葡漢混合語）、社會結構和思想習俗的獨特優勢，從史學的宏觀視野對澳門進行跨文化的語言研究和跨語言的文化研究，通過對澳門人尤其是土生葡人語言與歷史文化聯繫的精微考察，重新評估澳門歷史文化作為中西文明融會產物的人文價值，為新世紀澳門的發展方向提出新見解，認為將澳門“建設成為一個文化特區的意義要比搞經濟特區的意義更寶貴得多”，足證作者立意高遠，富有對澳門對祖國的高度責任心。該課題研究成果的顯著特色是跨學科性，通過對歷史和現實的語言作精密調查分析，深入研究土生葡人這一特殊族群（即將成為我國新的民族群體）的演變軌跡。所利用歷史學、語言學資料極為豐富，詮釋準確，在不同族群的文化認同、社會生活史、語言史上都提出有創意的見解，填補了澳門學的研究空白。

此書即將付梓，我為澳門研究領域又增添一部優秀成果感到萬分欣喜。承命作序，略述讀後感如上，未知當否？劉月蓮博士在澳門歷史語言文化的研究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後她一定會在澳門學研究領域做出更大的成就。

2003年仲秋寫於金陵樂友齋

序 二

魯國堯

我在研究生畢業後，1965年分配到南京大學任教，不久就知道陳得芝先生的大名。他是歷史名家，聲播遐邇，精通多種語言，因此也是歷史語言學家。論齒、論學，陳得芝先生都是我尊敬、學習的對象。我曾多次向他求教，都獲益良深，在南大的跨系的學術活動中，我都惟陳得芝教授馬首是瞻。2000年劉月蓮女士慕陳先生大名，專程來南京大學做博士後。她的出站報告，陳得芝教授也令我拜讀，我很佩服它的博與深。在這本出站報告的基礎上，劉月蓮女士精益求精，成就了這本《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此書即將面世，劉月蓮博士請我在陳得芝教授序之後也寫一序。我腹笥甚儉，不敢附陳序驥尾。但是如果峻拒，則又不恭，祇得談點“雜感”。

陳得芝先生對《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的評價：“所利用歷史學語言學資料極為豐富，詮釋準確，在不同族群的文化認同、社會生活史、語言史上都提出有創意的見解，填補了澳門學的研究空白。”陳先生的話可謂一錘定音。

我讀了劉月蓮女士的出站報告，首先十分佩服她的精神。她年齡不算大，但也不算小，卻不遠數千里從澳門來

南京求學，閉樓埋首讀萬卷書，精思獨運，寫成這樣一本富有學術意義、現實意義的著作，成為中年女子奮鬥成功的典型，值得天下學子學習，不論是巾幗還是鬚眉。

我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這個“X X 學”、那個“X X 學”紛紛破土而出。有人發表文章，表示懷疑，因為其中的確不乏巧立名目者。前天讀到《光明日報》CI版，有一篇報道，題為“恢宏的建構，理性的反思——諸家評說《中國魯迅學通史》”，述及一位專家很欣賞該書“以‘魯迅學’的專門名詞取代沿用已久的‘魯迅研究’”。鄙見：確實可以立一個“魯迅學”專名，猶如“詩經學”、“杜甫學”、“紅學”一樣，劉著中的“澳門學”的提法，我表示讚同，有如學界早達成共識的“徽州學”和近年竭力呼籲的“溫州學”。澳門開埠以來的四百多年的歷史，內涵很為豐富，於中於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研究澳門的古和今，當然夠得上稱為“學”了。而劉博士著作的貢獻在於為澳門學的深度和廣度都增添了不少內容。當今人人操觚，家家著述，可是“將 sketch 材料拉成小說”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被我的朋友 D 君斥為“垃圾”者有之。而能出現一本為一門學科添磚加瓦、彩畫其建構的專書，我們應該額手相慶。我想，劉博士自己也會感到欣慰的。

我的專業是漢語學，讀了劉博士的報告，我發現其中有不少關於澳門語言的論述，這部分自然引起我的興趣。我以前讀過《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因之研究過利瑪竇、龐迪我、金尼閣和明代“官話”問題。這三位泰西人都是從澳門開始進入中國的，龐迪我就是死在澳門的。澳門的葡萄牙語、漢語粵方言、漢語通語

彼此之間的接觸、影響達四百多年，當然還有英語、馬來語等的影響，這歷史太值得研究了，好多學者包括劉月蓮博士都做了艱苦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我以前從楊福綿神甫的〈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詞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第五期，商務印書館，1995年)長文裡知道有本16世紀西洋人編的《葡漢詞典》，而從劉博士的書中我知道在清代乾隆年間江蘇人印光任、安徽人張汝霖合著《澳門記略》，附有〈澳譯〉，這是研究18世紀的粵方言和澳門葡萄牙語的珍貴史料。當看到劉女士書中徵引的《日本唐音與明清官話的研究》時，我十分詫異，我的專業方向是漢語音韻學，怎麼沒聽說過這本書？因為劉博士在附注中指明該書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出的，於是我發伊美爾請西安的一位漢語音韻學家尋覓此書，答覆是“該書售罄”。劉月蓮博士熱情贈送此書複印件，我一看，原來是日語學的專家寫的，而我們漢語學人不知，真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又例如她提到詹姆遜《語言的牢籠》，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也是未聞，現在找南昌的朋友尋覓，看來也是希望渺茫的。於此可見劉博士讀書之多，徵引之富，我則相形見絀，能不汗顏？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陳得芝教授的序高屋建瓴，氣勢磅礴，我祇能拉雜絮語，用《世說新語》之類書中的語言，“其高下判然可分矣”。詹詹“識小”，不知可否應劉博士之命？

2003年9月20日

目 錄

前言	1
澳門歷史文化的人文主義視野	9
澳門：從歷史失語症看跨世紀文化整合	25
澳門歷史語言文化探述	51
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融合體	
——澳門土生葡人的來源與現狀	87
20 世紀西方學者對澳門土生葡人的研究	97
澳門土生葡人文學的兩個文本	
——馬若龍創作的〈玉墜〉和阿德收集的 〈中國新年〉	109
《澳門記略》探微	135
《澳門記略》附錄〈澳譯〉初探	169
李卓吾與利西泰	
——萬曆中西超儒之晤	215
後記	255

前 言

葡萄牙人夢寐以求“永駐”澳門港（Macau）的曖昧史（長達四個世紀），終於隨着20世紀的終結而終結。然而，作為歐亞兩種異質文化——葡萄牙文化和中華文化在澳門（Macau）遇合而產生的“遠緣雜交”的“私生子”（這個比喻有其確定的人類學依據），形成了所謂“澳門歷史-文化”領域的主要研究對象；或者說，澳門作為葡中人文歷史歷經四個世紀的碰撞磨合優勝弱汰，今天我們探索“澳門歷史文化”的豐富內涵，再也不可能簡單地分離出哪些是“遠東葡萄牙人”的文化遺產，澳門的哪些事物未曾受到傳統中華文化強勢的影響。

這也就是近年來正在冒頭的“澳門學”（Macaologia/Macaology）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使它在21世紀必然地將成為一門跨學科的新興邊緣學科，儘管“澳門學”的提法有點兒不合時宜（就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而言，Macaology對譯為“馬交學”似乎比較切近研究對象的特定內容）。

筆者的業餘興趣卻在於對有關澳門的“歷史語言”和“語言文化”兩者頗為模糊的視野嘗試作一些邊緣性的探索。這也促使我下了一點決心，要在澳門回歸祖國之際，獨自負笈到南京大學做一個博士後研究課題，希望在專門史領域心嚮往之的導師指點之下，開拓一角尚未被人充分注意的學術視域，置身於南京大學質樸而沉潛的學術氛圍氣裡認真交出幾頁功課。

1999年初，我進入思考令自己感到困惑的一些問題——

一、澳門歷史語言文化為何呈現如此撲朔迷離的視野？“語言變化”與“民族涵化”在澳門歷史進程中是否最終趨向“大一統”的“矛盾統一體”？或可理解為：“矛盾”通過對立面互相滲透產生的“中介”而趨向“統一”（卻非“同一”）的整體？

二、如何去進行澳門作為語言島（方言島）的歷時性考察（當然也涉及各個歷史時段的共時性的描述）？

三、馬可斯塔語（澳門話）猜想。澳門的語言問題絕非“ $1+1=2$ ”的加法可以概括。能否把“歷史失語症”作為探索澳門歷史語言文化的動態導標？

四、如何感悟澳門歷史語言文化作為“巫性載體”（由人類創造語詞的“神性”和人類被生存於其境的社會語言所支配的“奴性”撮合的象徵代碼）的迷人氣氛？由此涉及澳門土生葡人稀珍語言藝術文本的鉤沉。

五、澳門官方語言的“回歸”如何經歷了四個世紀“傳統內變遷”的影響？這一歷程也顯示了澳門社會交際語言歷經跨世紀的漸進性中斷而終於出現的戲劇性結局。澳門四個世紀難以確定的“官方語言”模稜兩可的曖昧狀態一下子在決定性的歷史性遽變關鍵時刻趨向於“回歸當代中華民族的共同語——普通話”的“大一統”母題。

六、“澳門歷史語言文化”由“澳門歷史”、“歷史語言”、“語言文化”三組相互切入不同層次的研究範疇解構生成。對它們進行解讀的困難乃在於：量性分析和歷史統計方法對於異質同構要素的比較分析無濟於事。等等。

上述的困惑主要涉及“專門史”研究領域方法論涉後引致的自閉症，實際上是傳統書齋鑄就的學究式的盲點囿限了當今益顯廣袤的學術視野。我由此開始注意若干被稱為“後學”的已由西方學者表述的新方法論，嘗試“引進”若干作借鑒運用於

對澳門歷史語言文化這個頗為陌生的課題的研討。

請允許我約略交代一下拙文寫作時嘗試“引進”若干“後現代方法論”所做的“形式實驗”。首先，我對被稱為“後範式”特徵的認識，主要來自利奧塔對“共識的懷疑”觀點（所謂“共識”，即給予科學的規則以合理性），認為現代知識“提煉我們對於差異性的敏感性，並且強化我們容忍那些無共同尺度標準而無法比較的事物的能力。”（《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因此，必須關心的問題是場域、意義、例外情況、不確定性等等，而不急於去強調對所觀察現象中的規律性進行解釋。這種“後範式”方法論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視為一個開放的話語領域，並在此一範圍內以文化試驗的術語去探究（……）概念在多元化的變遷世界狀況下所可能具有的意蘊。”（馬爾庫斯和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王銘銘、藍達居譯本頁29）——在這種“試驗性”寫作思想的驅使下，我嘗試傾向“敘述話語”，而不刻意照顧“邏輯論證”；試用“拼貼”手法並呈可能搜集到的值得小心保存的零星材料以彌補邏輯論證完整過程的欠缺。這種可稱為“讓材料說話”的方式，主要考慮迴避影響觀察澳門歷史—文化廣闊視野的後殖民主義權力話語殘障的影響。在一些明顯的生澀晦暗之處，當涉及非學術性的政治敏感話題而顯得不合時宜，就盡量迴避之，不可迴避者則借助於文學敘述的方式姑且留下感性的形象思維的記錄。之所以如此雜沓而欠章法，祇是想向有興趣於澳門語言文化歷史狀況的同學提供一些尚未被合理地有效利用的另類資料。澳門的歷史失語症是文化整合的負面現象，但澳門的文化整合具有真正的世界近世史意義和人類全景色彩的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宏觀視野。

我對耶穌會傳教士“華化”的語言策略與明、清官話是否也是當時在澳門港及我國沿海其它商貿區域流行的“常用語”問

題很感興趣。從這兩方面去蒐集材料進行整合比較的思路涉及的問題主要是：

一、澳門開埠前葡人在中國東南海域（主要有浙江雙嶼港、福建月港、浯嶼和廣東上川島、浪白潯等不同方言區）以及由雙嶼港與日本聯結的航線所使用的交際語言之追溯。

二、澳門聖保祿學院教授的“華語”，是“官話”還是“方言”？利瑪竇等入華傳教士與士大夫交往主要使用何種“cuoō cua（官話）”？

三、明、清派駐香山鑾管治澳門各級官員的籍貫和他們所說的“官話”是怎麼一回事？是否可以清理出一些可供作劃分歷史時段進行比較研究的罕見資料？

四、晚明“南京官話”與清廷使用的“官話”是否一樣？傳教士的適應策略在他們的著述中反映了多少明清社會交際語言的狀況？

五、澳門方言島如何形成？從當代珠江三角洲與澳門的方言調查資料中追尋澳門方言島的歷史語言生態信息這個重大課題毋疑地具有現代語言學的方法論意義。

六、廣州話如何歷史地成為土生葡人的家用“方言”，甚至成為他們的“母語”？是否有可能在若干個案研究中得到對澳門土生葡人“族群變異”的較為接近真實的人類學描述？

七、關於澳門“蜑家”歷史失語症問題的考察牽涉面更廣，需要這方面的專家指導才有可能開展田野調查工作，進入民族誌課題研究。現在可以做的是盡可能發掘民間的口傳資料進行錄存工作，盡早在周邊區域尋找明清蜑家遺孑的言語化石。

八、澳門回歸祖國促進土生葡人加緊學習普通話和漢字，這不僅僅是個“語言策略”問題，同時也是澳門歷史語言變異趨向於“大統一”的重要證據。由此我們可以高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我想，在這兒交代一下收入這個集子若干文章的寫作背景是有必要的。〈澳門：從歷史失語症看跨世紀文化整合〉一文的初稿是早在1992年春季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辦的“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與黃曉峰合作）。當時，我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作為期兩年的訪問學者，由於參與編寫《中國文學年鑑》（澳門部分）的一些工作，對澳門華人結結巴巴的“現代詩”語言頗為困惑，開始注意到澳門作為一個獨特的“方言島”是研究歷史語言文化的生動對象。然而，當時在這方面可讀的論著實在是鳳毛麟角，葡萄牙女學者阿馬羅（Dra. Ana Amaro）的重要著作《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Filhos da Terra*）的中譯本要到1993年才作為當時屈指可數的“澳門文化叢書”之一出版。1991年8月，我赴北京大學參加“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所提供的論文〈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融合體——澳門土生葡人的來源與現狀〉，就是緊迫地感到必須盡早開展研究澳門土生葡人文化的課題，因此提出了要“把澳門作為多學科的科研對象，澳門自身亦適宜作為一個探討中西文化融合的科研基地”的呼籲。〈澳門歷史文化的人文主義視野〉一文（與黃曉峰合作）則是在1994年1月舉行的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當時會議主持人之一、澳門大學葡語學院院長巴列度（Luis Filipe Barreto）認為，在1993年春末成立的澳門文化研究會“這一令人欣慰的積極舉措，促進了出於更好地瞭解過去與當今澳門社會和文化現實的願望相聚的葡中研究人員的接觸”，而“澳門數百年來的經歷就是東西方殊途同歸的歷史，……其獨特性是以四個世紀以來最大程度的差異之間存在的共同特點，即社會與文化之間的‘差異’可以融匯於全人類的基礎”。我們作為澳門文化研究會的創會成員當然格外關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領域的可拓展前景。在梁披雲會長、季羨林名譽會長等備受中外學人尊重的老前輩們的鼓勵和誘導之下，澳門文化研

究會在20世紀90年代盡其所能地為澳門的歷史文化研究做了一些推動工作。我們十分榮幸地得到梁老、季老和研究會諸君子同仁的關愛鼓勵，得以在那段急景流年的庸碌生活中留下了一點點純屬於個人自由空間的業餘寫作痕跡。本人尚未整理出版的《媽祖信仰與中外交通》（博士論文）就是受到澳門文化研究會於1995年舉辦的“媽祖信俗歷史文化研討會”的推動而投入此一專門史課題研究的。

從1990年代初到2000年初，我在澳門理工學院語言翻譯學校工作期間，教學對象包括居澳的葡萄牙籍人士、澳門土生葡人、主要以廣州話為母語的澳門本地華人、來自閩粵及各地區講各種方言的移民和海外華人，甚至還有講英語的各地區人士。他們多數是公務員，前來進修漢語知識，學習普通話，其中甚至有孜孜不倦地學了十二年中文課程的澳門土生葡人公務員，其精誠所至毅力表現令我深深感動。這些都大大地有助於我對澳門社會語言狀況的深入瞭解。然而，從1994至1997年期間，我因入廣州暨南大學攻前述專門史博士學位課題，澳門史語文化的調查工作也就擱了下來。直到1999年初，就在澳門回歸祖國前夕，我應北京一個有關“語言學與澳門回歸”研討會的邀請撰寫了〈澳門歷史語言文化探述〉這篇論文。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澳門方面有人把我從赴會代表的名單上勾掉了，那篇論文卻被收入了會議論文集。那篇看來結構鬆散的論稿，卻是我多年來對澳門歷史語言文化研究所作思考的一個論綱，因為它提出了一個可以作長時期深入研究的支撐課題，這就促使我萌生了重新上路尋師訪友作這個課題研究的打算。

1999年10月，我應邀赴南京參加一個討論澳門文學的會議，順道到南京大學拜訪陳得芝先生和劉迎勝教授。二位名師曾經屈駕擔任我在暨南大學進行博士學位答辯的評審人。南京大學的學術氛圍令我心儀已久，這就使我頓生投二位導師門下靜心做

點學問的奢望。我向南京大學提交了請求進入博士後流動站的申請。就在澳門回歸祖國之後的2000年春上，南京大學接納了我的申請。我慶幸又一次得到排除世俗困擾重進校園的機會。

我原本想依〈澳門歷史語言文化探述〉的行文思路分段蒐集資料，再做專題論述，像“來華耶穌會士的傳教語言策略”、“明清官話與澳門官商交際用語的關係”，一一梳理出脈絡來。然而，當我住進南大平倉巷博士後公寓開始靜下心來細讀《澳門記略》時，原來的寫作計劃就被撂到一邊去了，眼前展現一片荒天野地令我瞠目結舌，我這才發現研究澳門史語文化最重要的一個歷史文獻就是《澳門記略》，它毋疑是澳門史語領域裡獨一無二的一個完整的“歷史文本”，雖然它並非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澳門史語文化著述。於是，我十分匆忙地走進了印光任、張汝霖的那個世紀；印、張在我眼前打開了18世紀的澳門歷史文化全景。我開始察覺《澳門記略》的寫作動機被一種偽裝的精心結構隱蔽着，它的文字表層之下深藏着異乎尋常的歷史秘密。2001年8月，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在北京召開一個清史研討會，我得到一個極好的激發寫作慾望的機會，就趕做一篇剖析《澳門記略》夾註的論文去參加會議。在那個會議上，我發表了〈《澳門記略》探微〉一文，得到與會前輩師友的親切指教和熱情鼓勵。尤其是我的博士導師陳高華先生，當時因勞累成疾已住進醫院，我帶了論文去討教，得到恩師諄諄指點，令我畢生難忘。

在北京會議期間，全國李贄研究會會長張建業教授和師母特地到賓館看我，邀請我去雲南參加第二屆李贄研究學會年會。我十分高興地接受了邀請，先從北京到遼寧海城參加一個研討尚可喜的會議之後，又乘火車兜了大半個中國趕到雲南看李贄在姚安的遺跡去了。我交上的是〈李卓吾和利西泰——萬曆中西超儒之晤〉這篇論稿。我蒐集明清入華耶穌會士在各地所使用的交際語言資料時，特別注意利瑪竇從澳門往肇慶、韶州、南